

引文格式: 李雅兴 姚功武. 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探索历程、主要经验与价值指向[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1, 33(10): 11-18.

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探索历程、主要经验与价值指向

李雅兴 姚功武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主要职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政治协商的探索经历了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到“共同治国”的过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协商的根本保证,坚持承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协商的重要原则,坚持实现民族复兴是协商的共同价值目标。作为政治协商理论的创立者和践行者,毛泽东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关系学说,而且开创了世界政党史上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国家的成功范例,为后继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协商民主经验。

关键词: 毛泽东; 政治协商; 探索历程; 主要经验; 价值指向

DOI: 10.16396/j.cnki.sxgskxb.2021.10.003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85(2021)10-0011-08

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三项主要职能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重要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中开展广泛协商的民主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是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政治协商包括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1]。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与政党合作理论,创立了中国化的政治协商理论,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深入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探索历程及其主要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毛泽东为民族复兴所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探索历程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协商经历了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到“共同治国”的探索历程。

(一) 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联合革命

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就开门见山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292}随后,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明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联合的方法,并富有远见地预言“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394}这事实上是毛泽东联合革命思想即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民族解放作为自己的使命扛在肩上,由于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始了国共合作。共产党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积极与其合作,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

收稿日期: 2021-08-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及其对加强政党协商建设的意义研究”(16BKS015)

作者简介: 李雅兴(1966—),女,湖南隆回人,湘潭大学教授,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姚功武(1996—),男,江西上饶人,湘潭大学硕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国共两党之间以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协商解决两党间的各种重要事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是国共两党联合革命的首次实践,尽管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导致革命失败,但国共两党合作共事、团结协商等联合革命的精神,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政治协商和继续寻求民族解放之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疯狂侵略与掠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1935年12月,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判了过去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了凝聚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下,1937年建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行动纲领,主要采取党外合作、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方式处理共同事务^[3]。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意机关”的建议而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毛泽东等7名共产党员受邀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仍然固守一党专制,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人数占绝大多数而压制其他党派并控制其议程,但这毕竟是国民政府历史上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为中国各抗日党派提供了一个阐述各自政见的合法讲坛^[4]。在大后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平台,发表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建立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对改变此前国民党对中共的不实宣传、提升中共“软实力”、塑造中共良好政治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而采取一致行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中与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就实现民主宪政进行反复协商,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抗日根据地,为了凝聚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抗日,毛泽东创建了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为了克服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提高对“三三制”原则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与党外民主人士只有“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5]395},与他们“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5]396};这种民主合作,是“固定不移”“永远不变”^{[6]809}的,并将“三三制”推广到政府、

参议会及民众团体中。在“三三制”中,中国共产党就根据地政权建设加强与中间党派、无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协商合作,并使之成为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实践的制度载体,开创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成功范例。

(二) 解放战争时期的协商建国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人民对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日趋高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7]三大口号。毛泽东本人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抓住接触国统区广大民主人士、揭露蒋介石假和平面目、争取中间势力这个“决定胜负的因素”^{[8]748}的绝佳机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就和平建国大计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爱国人士进行反复协商,希望大家为“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9]而共同奋斗。经过43天的反复磋商、艰苦谈判,国共代表共同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结束训政以实施宪政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基本方针。在毛泽东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争取下,重庆谈判结束后,共产党和民盟等中间党派就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问题事先展开协商、交换意见,约定在一系列问题上互相支持、联合行动。政协会议最终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等五项决议案,对于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具有一定作用,基本符合人民对于和平建国的愿望和要求。尽管后来国民党不顾人民反对而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但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中的协商程序、协商形式、协商原则等协商精神被广为接受,政治协商成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认的议事原则和行动指南,“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10]。

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破坏停战协定,置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被提上了议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195}“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这恰好“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11]319}。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各地务必做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接送工作,以确保其安全到达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建立新政权期间,毛泽东亲自负责,多次与民主人士见面交谈,或致信、致电民主人士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及相关建国内容进行研讨、商量,充分表现出平等协商的精神。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多次筹备、充分协商和深入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顺利召开。在出席会议的662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约占56%,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广泛性。会议进程中,凡涉及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都要与民主人士进行广泛、平等、民主的协商,国歌、国旗、纪年、国徽的最终确定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协商精神^[12]。在新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6名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3人,占50%;4名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2人,占50%;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9人,占60%。这说明民主党派已经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中,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圆满完成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同治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全面执政,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有的认为民主党派可有可无,说他们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13]。他还把民主党派的工作方针由抗战时期的“团结、抗战、进步”改为“团结、建设、进步”,并帮助各民主党派清理整顿组织,发展新的组织成员,协商确定重点分工及活动范围,充分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成功召开,选举出新的国家领导人,党外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占了一定比例。一届人大通过的新中国首部宪法,明确了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及政治基础等内容,使民主党派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依据。但政协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被提上日程,毛泽东认为政协容纳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许多人“商量事情很需要”^{[14]384}。新中国的许多大事都需要跟他们的领导人“一起来协商”,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15]633-634}。在毛泽东看来,由于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民主是商量办事”^{[14]387},虽然“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15]635},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人民政协成为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这就使得政协的协商民主与人大的选举民主长期并存于中国民主制度中,二者相得益彰,既符合中国国情也具有中国特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民主党派是否要继续存在和发展呢?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要存在多久,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16]的“两个万岁”思想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7]34}的基本方针。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理由,认为那些为人民做了“好事”,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是“没有理由”不对他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的;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更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这样,我们的耳边能“听到不同声音”,“对我们更为有益”^{[17]235}。这些卓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发展,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外交等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事宜,与党外人士召开“协商座谈会”“双周座谈会”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积极参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主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党外人士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治理国家的生动活泼、和谐共处的良好格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虽

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足,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长时期的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遭受了挫折,但各民主党派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依然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二、毛泽东政治协商的主要经验

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密码”,也是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和现实需要。毛泽东作为政治协商的探索者和奠基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深化了对政治协商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协商的根本保证

领导权的问题是政治协商的首要的基本问题,直接关乎政治协商的方向和中国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革命和党的先进性质所决定的,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的历史选择,也是同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相契合的^[18]。毛泽东曾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深刻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9]1257}无论是国民革命时期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阵线,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抑或是抗战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成功或失败的关键都是领导权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深刻认识,“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20]308},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早在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建设中,毛泽东面对数量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员,认为只要“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8]742},就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这里的“质量”是指党员干部的言行一致和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协商指明了方向。此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是统一与独立并存,对国民党要“又团结又斗争”^{[20]316};中国共产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21]423}。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工人阶级领导权只有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新政协会议是在“我党领导之下”^{[19]1437}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更加明确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4]350}。可以看出,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强调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毛泽东认为,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21]426};领导不是喊出来的,而应体现在政策、工作和行动上,这才是实实在在的领导;领导也不能盛气凌人,对党外人士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不同意见要采取“说服和教育”,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些方法,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苦的斗争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党外爱国人士,1949年元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要领导人如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22],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8]652}。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协商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政治保障。共产党的领导越坚强有力,政治协商的优势越是凸显。

(二) 坚持以承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为协商的重要原则

政治协商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要实行真正的团结,就必须承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否则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战线,更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照顾同盟者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23]136},要求为群众谋切实的利益,重视与群众的协商对话。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极大地维护和照顾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力量都是共产党的同盟者。毛泽东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明确具体地阐述了照顾同盟者利益的重要性。他强调“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8]537}所谓互助,就是帮助同盟者解决实际困难和助其发展;所谓互让,就是在与同盟者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作出适当的让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认为,只有在

“尊重他们的利益”^{[8]747}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完成这一重要任务。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在政治上采取“三三制”、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在人民权利上规定爱国的地主资本家拥有同等的自由权利等系列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同盟者切身利益的保护。在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党外民主人士在法律、工作、学习和物质上享有与共产党人同样的待遇,即法律上“完全平等”,工作上给予“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学习上享有“同样的学习权利”,物质上给予“真正必需的帮助”^{[5]398}。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中给予协商对象的这些同等待遇,才使各中间党派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职责与使命,放弃自己主张而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实现对被领导者的领导,就必须给他们“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19]1273}。在协商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如前所述,许多重大决策都是集中党外人士智慧的结果,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党外人士担任职务的比例有的与中共持平,有的甚至超过了中共,这是对毛泽东把党外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权”^{[19]1437}思想的践行,也是给予他们民主政治权益的最好诠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充分照顾和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23]183}。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全局,统筹兼顾,通过制定各种具体方针政策,正确地处理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有效保障了同盟者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这不仅加强了与同盟者的联合,而且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成功。

(三) 坚持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协商的共同价值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4]这个复兴梦,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民族追求,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二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将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6]作为初心和使命,在实践中始终坚

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各阶级、阶层的梦想由分散走向凝聚的转变,形成了中华民族复兴梦的统一理想和价值目标。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基于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认识 and 需要,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政策基础展开协商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成功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篇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民族危亡之际,号召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8]357},并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展开第二次协商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8]364}。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11]195};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与中共同心同德,一致认为: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必须召开全国人民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共同的政治基础”^{[19]1464},也是共同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运用政治协商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12]。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而成为国家的主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以后,毛泽东认为“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14]386},我们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个商量政府”^{[17]178},深化和发展了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思想,就许多国家需要协商的重大问题,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长期合作”进行“诚恳地坦白地商量”^{[19]1437},恢复和发展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与党外民主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的一百年时间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和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7]。

三、毛泽东政治协商的价值指向

由上可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取

得了政治协商的重大成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指导和推动了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实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继者进行协商民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关系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过程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28]的问题,在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尽可能与其他政党进行合作,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9]。但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提出党派间的合作仅仅是统一战线的政党关系而已,对于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可以实行多党合作制度,并没有作出解答。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提出过多党合作的设想,但出于俄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最终还是“坚持一党专制”^[30]。毛泽东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关系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政党关系领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将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意义。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8]645}。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9]1257}。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只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走向成功。所以,毛泽东明确将统一战线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第二,将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发展为新型的国家政党制度。毛泽东不仅将多党合作看成是策略考虑,更是把其当作一种制度安排。1941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基本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6]809}。1945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6]1056}。在毛泽东多党合作理论的指引下,共产党不仅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精诚合作的友好关系,而且构建起合作型政党政治的制度框架,进

而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后,逐渐成为了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为了充分调动党外人士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将“党和非党的关系”总结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7]34}。1957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的由来、政治基础及内涵等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一基本方针的提出与执行,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人心,强有力地说明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不同于欧美的多党和两党竞争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而是互相协商、团结合作的关系。

(二) 开创了世界政党史上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国家的成功范例

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中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上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功。回溯历史,可以看见,无论是为协商建立新中国提供理论准备,还是推动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再到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明确提出并阐释“民主共和国”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1940年,毛泽东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描绘了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美好蓝图,同时也阐明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方式。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纲领、程序、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在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阐述了新中国的性质、外交政策和国家中各阶级的地位等问题。正是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思想与建立国家新政权结合起来,从而为协商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参与筹备、精心组织新政协会议的重大事项。为确保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毛泽东具体领导了新政协筹备工作,并就新政协会议的重大问题多方协商、共同决策,树立起民主协商的表率。经过精心筹备,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6月15日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后,毛泽东作为筹备会主任对相关重要文件反复协商、精心修改。同年9月17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听取相关筹备报告,会议原则通过了共同纲领草案、政协和政府组织法草案等各项文件^[31],为协商建立新

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三,主持召开新政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经过充分协商和筹备,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在北平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向世人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2]新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通过人民革命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具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开创了世界政党史上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国家的成功范例,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从此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的发展时代。

(三)为后继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经验

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不仅对于革命和建设时期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仍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第一,从认识论维度看,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保证政治协商发展的生命线。毛泽东曾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进行过科学阐释,并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8]52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决与政治协商中的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等错误认识作斗争,系统解决了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认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规律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把握,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政治协商主体间的关系。这些科学的认识 and 思想路线,不仅使得共产党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思维对待党外人士,而且使得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从而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良好局面,为新时期推动政治协商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从方法论维度看,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方法保障。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问题,他曾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关于“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8]533}。在政治协商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论的指导作用,领导创造了诸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工作方法,主要包括求同存异的方法、民主协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等内容。可以说,毛泽东所论述的政治协商的工作方法是系统全面的,既是对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在长期实践中对政治协商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前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保障。

第三,从价值论维度看,为协商民主提供了价值指引。坚持政治协商服务于中心工作是毛泽东在对政治协商的探索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协商始终围绕“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始终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人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实践表明,毛泽东政治协商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更要充分挖掘、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33]，“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7],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林尚立. 新中国共产党制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38.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0.
- [3] 黄修黎, 黄黎. 国共关系纪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318.
- [4] 赵祖平.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 国民参政会[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7): 157-163.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2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5.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9.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3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04.
- [11] 中央统战部,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 [12] 李雅兴, 伍安. 毛泽东对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贡献[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2): 111-119.
- [13]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6.
-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2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63.

- [1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8] 郭红军.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探论[J]. 中州学刊, 2017(10): 17-22.
- [1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9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216.
- [2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2版.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36.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3.
- [26]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1.
- [2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2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92.
- [2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6.
- [30]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8.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377.
- [3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3.
- [3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92.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Process , Main Experie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LI Yaxing , YAO Gongwu

(School of Marxism , Research Center of Mao Zedong Thought ,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 411105 ,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s a major function of the CPPCC and a great creation of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joint revolution" to "founding the country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then to "co-governance" , and has accumulated many valuable experiences , mainly including: adhering to tak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consultation , adhering to taking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recognizing and taking care of the interests of allies as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consultation , and adhering to tak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common value goal of the consultation. As the founder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 Mao Zedong not on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theory about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 , but also set up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using political consultation to establish a new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world , which provides referential experienc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for his successors.

Key words: Mao Zedong; political consultation; exploration process; main experience; value orientation

[编辑 王晶冰]